

诸葛亮与三国文化(七)

ZHUGELIANG YU SANGUO WENHUA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 编

2014年(总第⑦辑)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诸葛亮 与三国文化（七）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 编

2014年（总第7辑）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诸葛亮与三国文化(七)/谢辉等主编. -- 成都: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7-5364-8025-4

I. ①诸… II. ①谢… III. ①诸葛亮(181~234) —
人物研究②传统文化—研究—中国—三国时代 IV.
①K827=362②K236.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304222号

诸葛亮与三国文化(七)

ZHUGELIANG YU SANGUO WENHUA 2014年(总第7辑)

出品人 钱丹凝
主 编 谢 辉 李加锋 罗开玉 梅铮铮
责任编辑 宋 齐
封面设计 张 勇
版面设计 梁 成
责任印制 欧晓春
出版发行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 邮政编码 610031)

成品尺寸 285mm×210mm
印 张 14.5
字 数 360千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4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64-8025-4
定 价 45.00元



《诸葛亮与三国文化（七）》

编委会

单 位

成都市诸葛亮研究会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

主 任

谢 辉

编 委

阎瑞海 李加锋 方北辰 沈伯俊 谭良啸 吕一飞 罗开玉
何红英 卫永锋 丁 浩 周可华 李亚红 罗新本 高大伦
段 渝 江章华 许蓉生 张渝新 梅铮铮 张红灵 安剑华
符丽平

主 编

谢 辉 李加锋 罗开玉 梅铮铮

诸葛亮南征考察专题

诸葛亮南征的意义.....	梁满仓	2
诸葛亮平定和管理南中的典范性意义.....	方北辰	7
论诸葛亮南征及其影响.....	李兆成	15
从历史文献用词论孟获族属.....	梅铮铮 王 珍	31
略论蜀汉兴衰与诸葛亮南征.....	黄剑华	37
明代云南永昌地区武侯传说、遗迹与庙宇.....	罗 勇	53
三国新道县初探.....	罗家祥	62
蜀汉牂牁“夷帅”济火其人其事考述.....	张 祎 谭良啸	73
诸葛亮南征文化遗产对南中地区旅游资源开发的影响.....	商 军	78
诸葛亮南征区域辨疑.....	赵 彬	84
诸葛亮南征遗迹旅游开发初探.....	申 雷	90

历史探索

成都秦汉至唐宋时期的冶金成就.....	李映福 肖碧瑞	96
论新发现北宋范祖禹侄女诔文的价值.....	张渝新	106
汉嘉太守黄元之乱二题.....	杨 民	111
蜀汉封爵制与诸葛亮“限之以爵”考析.....	奚 奕 谭良啸	117
浅析西南丝绸之路源头——成都在汉末三国时期中的地位与作用.....	王 珍	127



文化苑地

三国文化与巴蜀	沈伯俊	132
论锦里的建筑	玉 辛	136
锦里园林的景观特点	李祥林 张渝新	139
杜甫对诸葛亮形象的完美化及原因		
——兼论杜诗中的诸葛亮形象对诸葛亮形象发展的定型化	符丽平	144
诸葛亮一生中的几次“涕泣”解析	陈 颖 谭良啸	151
诗与诸葛亮	吴 娟 安剑华	161
浅谈文化遗产的保护性旅游开发——以武侯祠—锦里和洛带古镇为例	高 燕	169

文博研究

考察与科研结合，拓宽三国文化研究领域

——“全国三国文化遗产考察暨诸葛亮南征研讨会”会议发言	谢 辉	174
全国三国文化遗产考察暨诸葛亮南征研讨会综述	李加锋	177

博物馆藏品架起沟通的桥梁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5·18国际博物馆日”活动纪实	何红英 吴 娟	180
记武侯祠馆藏清道光粉彩“无双谱”人物图盆	车 蓉	182
浅析遗址类博物馆临时展览的选题与策展		

——以“南中寻珍：诸葛亮南征路线出土文物汇报展”为例	尹 恒	185
----------------------------------	-----	-----

武侯祠西区打造三国文化景点的探索.....刘 斌 193

三国文化青少年普及教育的应用探索

——以武侯祠“三国小学堂，成语三国”教学方案为例.....崔兴灿 何红英 196

青 年 苑 地

对蜀汉官员信息的浅析汇总.....李 志 谢佳倩 200

浅谈成都武侯祠建筑的宗教性.....肖又尺 车 蓉 211

略说孔明之“智”.....吴云霞 马 红 215

略论诸葛亮的用人标准及启迪.....李 晶 220

后 记.....225



诸葛亮南征考察专题



诸葛亮南征的意义

梁满仓

(中国社会科学院)

诸葛亮南征是三国史研究的老话题,关于南征的意义论者也大有人在。但大多是作为附带问题加以论述的,专门论述南征意义的文章似不多见。由于没有对诸葛亮南征的意义加以特别关注,因此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有些问题没有谈到,有些问题谈到了却没谈深谈透。当然笔者也不认为这篇文章就能对诸葛亮南征的意义全面作深入的研究,只是希望能对以往论述加以拾遗补缺。

一、迅速结束战争,不失北伐时机

诸葛亮于建兴三年(225年)春三月开始南征,从成都顺岷江南下至犍道(今四川宜宾),然后折头向西南经安上(今四川屏山)、新道(今云南绥江)、马湖(今四川雷波),直至邛都(今四川西昌)。从邛都又南下经会无(今四川会理)、三缝(今四川会理黎溪),五月渡过泸水(金沙江)至蜻蛉(今云南大姚)、弄栋(今云南姚安),再折头向东,当年秋天在滇池与李恢、马忠军会师,基本上平定了南中之乱。然后由昆明北还,经味县(今云南曲靖)、汉阳(今贵州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至犍道,沿岷江十二月返回成都,前后只用约10个月时间。

迅速解决南中问题,就抓住了北伐曹魏的

有利时机。事实上,在诸葛亮南征及南征后的一二年中,曹魏方面确实出现了于蜀汉出兵有利的情况。

首先是曹魏和孙吴的关系越来越坏。孙权黄武四年(225年)冬十月,也就是诸葛亮已经平定了南中之乱,对那里正在进行抚慰时,魏文帝曹丕带领10万大军开至广陵(今江苏扬州市西北),临江观兵,给孙吴施加压力。曹兵旌旗连绵数百里,跃跃欲试,作出准备渡江的态势。孙权大惊,严设固守。只因天寒,江边结冰,船不得入,曹丕才下令撤军。曹军撤退时,吴将孙韶又派高寿率500敢死士卒从小路乘夜袭击,并缴获了曹军的一些军资器械。^[1]

其次是曹魏国内阶级矛盾加剧。曹丕黄初五年(224年)正月,即诸葛亮南征的前一年,魏文帝“初令谋反大逆乃得相告”。^[2]号召国内揭发谋反大逆,说明国内阶级矛盾的尖锐。第二年六月,又发生了利城郡兵蔡方等人据郡反叛,杀太守徐质的事件。曹魏统治阶级内部也出现了明显的裂痕。曹丕称帝后,有意提拔与自己关系亲密的宗族将领曹真主持朝廷军务。但因曹真年资不高,不好一下给以大将军的高位,便专为他设立上军大将军、中军大将军两个名号,以便向大将军过渡。黄初三年(222年)曹真升任上军大将军,进京主持全国军务。同年又转中军大将

二、实现了南中的基本稳定，免除了北伐的后顾之忧

南中之乱，有其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内部因素，一是南中有些大姓借东汉统一政权分崩离析的机会，企图使南中脱离蜀汉政权的控制。益州郡大姓雍闿给李严的回信很典型地反映了这种倾向。这些企图分裂的大姓利用自己在南中的势力和影响，利用南中少数民族对历代封建政府压榨他们造成的反感，企图实现自己的阴谋。外部因素是当时孙吴政权利用夷陵之战胜利之机，对南中一些大姓进行拉拢，煽动他们脱离蜀汉政权。

诸葛亮解决南中问题，根据这两方面的因素对症下药。他用军事力量镇压了一些南中大姓所煽动的叛乱，又对南中大姓、少数民族渠帅进行了心理攻势，对他们进行心理征服。除此以外，他还在南中对少数民族群众实行安抚政策，得到了他们的拥护。对待外部因素，诸葛亮积极与孙吴改善关系，恢复联盟，使其不对南中施加压力和影响。

经过诸葛亮的努力，南中实现了纲纪粗定，夷汉粗安，一些忠于蜀汉政权的南中大姓得到了重用，心怀异志的首领也表示“南人不复反矣”。诱使南中动乱的外部因素也起了很大变化。孙权黄武五年(226年)，也就是诸葛亮平定南中的第二年，曾经煽诱雍闿叛乱的孙吴交趾太守士燮死去，孙权乘机对交趾进行调整。交趾远离孙吴政治中心，孙吴对其难以进行有效控制，所以，士氏在交趾形成了很大的地方势力。士燮死后，孙权乘机加强了对交趾的控制。他把交趾分为几部分，合浦为广州，以吕岱为刺史；交趾以南为交州，以戴良为刺史；又派陈时代替士燮为交趾太守。孙权的这些措施引起士燮的儿子士徽的强烈不满，他自任交趾太守，并派兵拒绝戴良入境，戴良被迫留在合浦。孙权命吕岱兴兵讨伐士徽，吕岱率军自广州出发，过合浦与戴良合兵

军。黄初七年(226年)五月，魏文帝临死时，遗诏让曹真、陈群、曹休、司马懿辅政。曹真的迅速升迁，引起了曹魏宗室另一个人的极大不满，这就是曹休。曹休认为：论资历，曹真与自己不相上下；论亲疏，自己是正宗曹氏宗亲，而曹真不过是太祖(即曹操)养子，他本姓秦，非曹氏正宗。他凭什么入京执掌兵权，又出任首席辅政大臣！新即位的魏明帝曹睿看出了曹休的心思，为了安抚曹休以稳定政局，在封曹真为大将军的同时，又封曹休为大司马，地位略比大将军高，这才将矛盾缓和下来。^[3]

在曹魏西南与蜀汉邻近的新城郡(治今湖北房县)，也出了问题。新城郡太守是蜀汉降将孟达。孟达初降，魏文帝曹丕听臣下说他有将帅之才，卿相之器，对他非常赏识，拜他为散骑常侍，领新城太守，委以西南之任。当时众臣中有人认为文帝待孟达太厚，不应该将西南之任交给他。曹丕说：“吾保其无他，亦譬以蒿箭射蒿中耳。”当时，孟达既深受曹丕信任，又与曹魏重臣桓阶、夏侯尚等人交好，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但好景不长，不久，桓阶、夏侯尚先后死去，魏兴太守申仪也与他矛盾很深，这使孟达不禁生出羁旅他乡，寄人篱下的伤感。^[4]正在这时，一个叫王冲的人来见孟达。这个王冲，原是蜀汉中都护李严手下的一个牙门将，为李严所嫉恨，惧罪降魏。他见到孟达，说起了当年孟达降魏时，诸葛亮如何咬牙切齿地要杀孟达的家属，多亏了刘备不接受诸葛亮的意见。孟达对王冲的话一点也不相信，言谈中还表示了对诸葛亮的委仰之情。这些话恰好又被一个叫李鸿的人听见了。李鸿正欲投降蜀汉，他知道孟达也有此意，便急忙入蜀南下见诸葛亮。这件事是诸葛亮南征这年发生的。李鸿南下见诸葛亮，正值诸葛亮平定南中，撤军走到汉阳。

上述曹魏政权中所发生的一切，对蜀汉政权来说，正是出兵攻伐的好时机。诸葛亮迅速解决南中问题，因而没有错过这种时机。



俱进。士徽的从兄士匡与吕岱关系很好，又任吕岱的师友从事。吕岱便派士匡前去劝士徽投降，并保证其无性命之忧。不料，当士徽领兄弟士祗、士干、士颂等前来投降时，却被吕岱一一诛杀。士氏与孙吴政权的矛盾一直到数年之后才解决。交趾的这种形势，使其无力顾及南中，这无疑有利于南中地区的进一步稳定。

“定南中然后可以固巴蜀，固巴蜀然后可以图关中。”清人顾祖禹这句话，可谓一语说中南中的稳定，对蜀汉政权及其北伐的重要意义。

三、开发南中的兵源财源， 支援北伐战争

南中古称“不毛之地”。其实，不毛之地，只是未经开发的原始荒蛮状态，南中的物产还是很丰富的。据史书记载，牂牁郡平夷县出产茶、蜜。晋宁郡土地平敞，有原田，产鸚鵡、孔雀，有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晋宁郡的连然县“有盐泉，南中共仰之”。^[5]建宁郡牧靡县，山中所产的升麻，是解毒的好药材。据说当百花盛开的时节，飞鸟误食乌喙口中中毒者，“必急飞往牧靡山，啄牧靡(即升麻)以解毒。”^[6]朱提郡的堂螂县有堂螂山，山中出银、铅、白铜等，还出产一种名为螳螂附子的药材，有温肾回阳、行水止痛之良效。滇西的永昌郡，土地沃腴，出产黄金、光珠、琥珀、翡翠、孔雀、犀、象、蚕桑、锦绢、彩帛、文绣等物品。据《蛮书》卷七记载：唐德宗贞元十年(794年)，南诏蒙异弁寻进献一块琥珀重26斤。永昌郡所产濮竹，昂司达十丈，径可长一尺，其纤维柔软细微，剖之缕缕如麻，可用其纤维织鞋，故又有麻竹之称。还有梧桐木，“其华柔如丝，民绩以为布，幅广五尺以还，洁白不受污，俗名曰桐华布。”永昌郡还产一种名为兰干的芝麻，用它织成的兰干细布，“文如绫锦”。此外，永昌郡还“宜五谷，出铜

锡”，“又有厨旄、帛叠、水精、琉璃、轸虫、蚌珠。”永昌郡的博南县“有金沙，以火融之为黄金。有光珠穴，出光珠。有虎魄，能吸芥。”梁水县“有振山，出铜”。律高县“西有石空山，出锡；东南有监町山，出银”。诸葛亮征服南中，对南中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加以开发利用，使之为北伐服务。史载诸葛亮平南中后，“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7]这正说明征服南中对北伐的积极意义。

毫无疑问，诸葛亮南征最直接的出发点是为了北伐，因此，建立一个稳定的南中对支持北伐的意义能直接迅速地显现出来。

四、加快了对南中地区的开发

南中地区自汉武帝开始立郡，直至东汉明帝时，才在南中地区设置四个郡，蜀汉政权建立后，刘备便在南中建立朱提郡，并设立庾降都督统管南中事务。诸葛亮平定南中后，又从南中五郡中分出两个郡，使南中一下变成七个郡。这种政治措施对于加强南中与中央朝廷的关系具有深远意义。

蜀汉在南中设庾降都督前，南中四郡虽归益州刺史督察，但实际上独立性很强。我们知道，汉武帝所置十三州刺史不是一级行政机构，它没有治所，只是巡行诸郡，监察豪右，黜置能否，审理冤狱。而南中三郡地处偏远，刺史的监察鞭长莫及。东汉前期，刺史在监察区有了固定的办公地点和属官，具有行政机构的雏形和初级职能，但它真正成为一级国家行政机构还是在东汉末期。但是不久，东汉王朝便土崩瓦解，各路军阀互相混战，益州刺史刘焉父子据州自保，主要精力放在北方、东方，无暇顾及南中。所以，自汉武帝在南中设郡以来，南中虽是中央政权管

辖的行政区域，但与中央政权的联系不够密切。蜀汉政权的建立，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标志着东汉末战乱纷争的局面结束，局部统一形成。局部统一的实现，使蜀汉政权有条件对南中进行更加切实有效的行政管理。庾降都督就是介于郡与中央朝廷之间的一级行政机构，它虽未称刺史，但实际上具有对南中地区实行统一管理的刺史职能。诸葛亮平定南中后，将原来的五个郡变成七个郡。郡多了，县也要跟着增加，随着大郡变成小郡，大县也生出了小县。束世澂先生曾专门对南中增郡后县的增加作了考察，指出在蜀汉时期，南中共增加了12个县：朱提郡增设南昌县；越嶲郡增设安上、马湖两县；建宁郡增设存驰、新定、修云、伶邱四县；牂牁郡增设广谈县；永昌郡增设永寿、雍乡、南涪三县；兴古郡增设汉兴县。^[8]南中郡级、县级机构的增多，意味着蜀汉在南中地区官吏数量的增加，意味着南中政权所统辖的区域增大、人口增多，意味着蜀汉政权对南中地区统治的加强，意味着南中与蜀汉政治联系的加强。

西晋武帝泰始六年(270年)，“以益州大，分南中四郡为宁州。”^[9]另据《晋书》卷三《武帝纪》，宁州之置在泰始七年(271年)。这四个郡，是建宁郡、兴古郡、云南郡、永昌郡。^[10]西晋在南中设宁州，并派刺史管理宁州，这是个很大的变化，它表明南中与中央朝廷政治联系的程度已经大大超过了两汉。西晋在南中设州一级的行政机构，理由是因为“益州大”。这是经不住推敲的。西汉时期，益州刺史监察的范围包括南中，东汉时，益州刺史或益州牧监管统治的范围也包括南中地区。那个时候为什么未觉得益州大，而在益州单划出一州呢？我们认为，西晋在南中设州，重要原因并不是益州大，而是贯穿蜀汉40余年对南中的开发治理，南中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迫切需要中央政权在南中行使行政权力，使朝廷在南中实行有效的统治。从晋武帝泰

始六年(270年)以后，西晋在南中的行政机构虽然名称几经变化，但其州一级的行政级别始终未变。泰始六年(270年)，距西晋灭蜀仅仅8年时间，我们知道，设一个州需要有一定的政治经济前提，两汉几百年都未能在南中设州，西晋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在南中设州，显然与蜀汉对该地的开发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蜀汉在南中所设的庾降都督，是西晋宁州的前身。

诸葛亮南征的结果，不但加强了南中地区与蜀汉的政治联系，也促进了南中地区的经济开发。

诸葛亮及蜀汉政权把汉族地区的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推广到南中地区，至今在云贵地区还流传着许多关于诸葛亮推广农业生产技术的传说。如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傣族有诸葛亮给他们带来耕牛，教他们用牛力代替人耕的传说。在云南保山县城南约10里的地方，有三个“诸葛堰”，至今还发挥着灌溉农田的作用，传说也是当年诸葛亮修筑的。佤族人传说诸葛亮教他们的祖先盖房子、编竹箩、给他们稻种。傣族说他们佛寺大殿的屋顶就是受诸葛亮帽子式样的启发建造的。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云贵地区一些少数民族还称诸葛亮为“孔明老爹”。《刘宾客嘉话录》中还有这样一段记载：

公曰：诸葛所止，令兵士独种蔓菁者何？绡曰：莫不是取其才出甲者生啖，一也；叶舒可煮食，二也；久居随以滋长，三也；弃去不惜，四也；回则易寻而采之，五也；冬有根可鬻食，六也。比诸蔬属，其利不亦博乎？曰：信矣。三蜀之人，今呼蔓菁为诸葛菜，江陵亦然。^[11]

这段话中记载了“诸葛菜”的六大好处：果实可以生吃，叶子可以煮食，容易成活，弃去亦不可惜，容易摘采，冬季无菜时其根可食。这种“诸葛菜”本在巴蜀、荆楚地区生长，但也传入了南中。《云南记》载：

州界缘山野间，有菜，大叶而粗茎，其根若大萝卜土人蒸煮其根叶而食之，可以疗疾，名之



为“诸葛菜”。云武侯南征用此菜种于山中，以济军食，亦犹广都县山栉林谓之“诸葛木”也。^[12]

上述传说，反映了诸葛亮治理蜀汉期间，对南中的经济开发和文化传播。传说不是史实，但传说却源于历史，如果把南中经济文化开发同诸葛亮南征和蜀汉对南中治理所实行的政策加以联想，不能不承认传说之中包含着一定的真实性。

南中地区的经济发展，我们还可以以蜀汉为界，把其前后变化作一比较。

西晋时，“建宁太守巴西杜俊、朱提太守梓潼雍约，儒纯无治，政以贿成。俊夺大姓铁官令毛洗、中郎李睿部曲……”从这个记载看，西晋时在南中设置铁官，有的并由南中大姓担任。我们知道，西汉时云南铁器主要来自蜀中，自己境内有铁矿尚不知开采，更无冶铸技术。直到东汉，才有冶铸的记载。

《后汉书》卷二十三《郡国志》载：滇池出铁。俞元装山出铜。律高石室山出锡。监町山出银、铅。贲古采山出铜、锡。羊山出银、铅。但无铁官的记载。蜀汉建立后，实行国家专营冶铁政策，设置专门机构及官员。西晋在南中建宁设铁官令，显然与蜀汉对南中地区冶铁业开发有关。南中地区铁器普遍用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应是从蜀汉统治时开始的，这对于生产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南广县》条载：“南广县，郡治。汉武帝太初元年置。有盐官。”乍一看，好像南广县从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就开始置盐官了。其实不然，我们遍翻《汉书》，并没有南广县置盐官的记载。仔细推敲，这个记载其实是讲，汉武帝太初元年置南广县。而在南广设郡治，是蜀汉延熙年间(238—257年)的事，只有在南广设郡，南广县才有可能称郡治。所以，“有盐官”，是指蜀汉设南广郡时并设盐官，西晋可能沿袭下来，这正说明了蜀

汉对南中地区的经济开发。西晋政府在南中设宁州后，“每夷贡南夷府，人牛、金、旃、马，动以万计。”^[13]这条记载一方面说明，朝廷对南中盘剥之狠；另一方面也说明，经过蜀汉对南中经济的进一步开发，南中的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

蜀汉南征，一举两得。稳定了后方，增强了国力，支援了北伐，此为一得；进一步开发了南中，加强了南中与内地政治经济的联系，此为二得。前一得是蜀汉统治者主观努力所奋力追求的目标，后一得是这种努力所带来的客观后果。然而，前一得的意义只存在了几十年，后一得的意义却千年不灭，它为祖国西南边疆的建设和巩固作出了重要贡献。

◎注释：

- [1]《三国志·吴书》卷二十四《吴主传》裴注引《吴录》，《三国志·魏书》卷二《文帝纪》。
- [2]《三国志·魏书》卷二《文帝纪》。
- [3]方北辰：《三国志注译》卷二、卷九注。
- [4]《三国志·魏书》卷三《明帝纪》裴注引《魏略》。
- [5]《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
- [6]《水经注》卷三十四《若水》。
- [7]以上引号中所引资料均出自《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
- [8]束世澂：《蜀汉开发南蛮考》，载于1922年5月《史地学报》第一卷第三、四期。
- [9]《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
- [10]《晋书》卷十四《地理志》。
- [11]唐韦绚：《刘宾客嘉话录》。
- [12]《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
- [13]《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

诸葛亮平定和管理南中的典范性意义

方北辰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民族融合，是古代中国的重要现象。大规模的民族融合浪潮，曾经有三次：第一次在春秋和战国时期，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中国统一时期的第一次高峰——秦汉皇朝；第二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中国统一时期的第二次高峰——隋唐皇朝；第三次在宋辽金元时期，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中国统一时期最后的第三次高峰——明清皇朝。从宏观的大趋势来看，中华民族是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各种民族的营养成分，从而形成的多元化共同体；与之相应的中华文明，也是一种兼收并蓄的多元化共同体。

三国时期，正好处于魏晋南北朝第二次民族融合大浪潮的开端。如果将诸葛亮对南中的平定和管理，放在民族融合的大背景之中来观察，就能更清晰地看到其中的典范性意义。本文拟就此试作初步的探讨。

一、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融合概况

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融合，可以分为北方和南方两大板块，现简要叙述其概况。

1. 北方民族融合概况

匈奴 是古老的草原民族，东汉初分裂为

南北两部分：北匈奴西迁，南匈奴则归附东汉皇朝。董卓之乱时，南下进入边境，居住在当时的并州，即今山西省的境内。为了分散南匈奴的力量，曹操下令将其分为东南西北中五部。西晋末年，首领刘渊首先起兵建立政权，国号为“汉”，追尊刘邦为太祖、刘秀为世祖、刘备为烈祖，合称“三祖”，又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匈奴的另一支赫连氏，在黄河上游建立政权，国号为“夏”。还有依附于匈奴的卢水胡部落，在河西走廊的张掖郡建立北凉政权。

乌桓 也是草原民族，东汉末聚居在幽州的辽西郡、右北平郡、辽东属国三个郡级行政区，合称“三郡乌桓”。有人将辽东属国误以为是辽东郡，不确。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出兵塞外，大败乌桓族骑兵，部落成员一部分编入军队，其余则迁入内地。

鲜卑 也是古老民族，原居今大兴安岭。匈奴衰落，鲜卑趁机向外发展，发展方向分为三路：向东面辽水流域推进的，是慕容部、宇文部、段部；向中部的内蒙古以及山西、河北推进的，主要是拓跋部；向西面陕西、甘肃方向推进的，有秃发部、乞伏部。西晋灭亡，拓跋部在北面建立代国，即后来的北魏。慕容部在东面先后建立前燕、后燕、西燕、南燕。在西面，秃发部



建立南凉，乞伏部建立西秦，宇文部建立北周。

羯 是受匈奴统率的另一部族，跟随南匈奴进入塞内，后来在襄国（今河北省邢台市）建立政权，史称后赵。其首领石勒的名言是：“大丈夫行事，当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后来其侄子石虎夺取权位，迁都到邺县，即曹操封地的都城。

氐 是西部的古老民族。曹操进攻马超、张鲁，先后迁徙武都郡氐族五万多家，到渭河流域的天水郡、扶风郡，此后还内迁过多次。西晋末年，氐族人遍布于渭河流域。其后，苻氏家族建立前秦政权。又有吕氏家族在武威郡建立后凉。还有杨氏家族，在武都郡内仇池山（今甘肃省成县西）一带，建立仇池国，但不在十六国之列。

羌 也是西部的古老民族。东汉发动三次大反抗，使得朝廷国力耗尽，无法应对黄巾军起事，被迫求助于地方武装，就给刘备、孙坚、曹操等风云人物，提供了武力创业的大好机会。魏晋时的关中地区，羌族居民密布，后来姚氏家族建立后秦政权。

賨 本是巴族一支，原居嘉陵江上游。刘璋征调賨族为兵，抵御汉中张鲁。而賨族大多信奉张鲁的五斗米道，纷纷逃往汉中。此后曹操放弃汉中，又将当地賨族居民，迁移到曹魏境内的略阳、天水一带。西晋末年，一部分人在李特的率领下，回到益州建立成汉政权。

2. 南方民族融合概况

夷 在今四川、云南、贵州的广大地区，两汉以来分布有不同种类的少数民族，史书统称为“夷”或“西南夷”。三国时此处称为南中。诸葛亮平定南中，是这一地区的重大历史事件。西晋武帝时，将南中的建宁、兴古、云南三郡，加上交州的永昌郡，设置宁州。此后宁州或废或置，是中央政府对这一地区重视程度的反映。

山越 东汉后期，在今安徽、江西、江苏、浙江四省交界的山区，有大量山民，多是古代越族人的后裔，故统称“山越”。孙吴长期掠取山越出山，壮丁编入军队，体力较弱分配到屯田区当农民。这一过程持续近40年，单是编入军队者就有十多万人。在山越的原住地，随之设立了大量的郡县级行政机构，全面推行封建化过程。

蛮 当时是对长江中游地区少数民族的统称。其中，又有盘瓠蛮、莫徕蛮、荆州蛮、雍州蛮、豫州蛮之分。刘备东下复仇，曾经派马良前往武陵郡，联络五溪蛮。而“五溪”，系指湘西沅江的五条支流：雄溪、楠溪、无溪、酉溪、辰溪。

僭 东晋南朝时居住在今赣南、粤北一带，常常被掠夺为奴婢，所以东晋末曾经发起武装反抗。南北朝后，文献中很少见到记载。

僚 古代史书写作“獠”。十六国时期，僚人大量迁移到巴蜀地区，从汉中一直分布到川南。成汉末年，曾发起大规模武装反抗，成为成汉政权灭亡的原因之一。北朝中期，进入蜀地的僚人更多，居住最集中的隆城镇，就有20万户之多。

二、诸葛亮平定南中的典范性意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方的民族融合，如果从民族之间的关系来看，最值得注意的是两种类型：即激烈冲突型和相对和平型。

激烈冲突型 属于这种类型的族群最为常见，占了当时族群的大多数，比如北方的鲜卑、匈奴和乌桓；南方的山越、僭和僚。这种融合，是在激烈的冲突中进行，往往伴随着大规模流血事件的发生，尤其以北方的族群为甚。

相对和平型 属于这种类型的族群并不多见，典型的代表是西南夷，也就是诸葛亮平定南中时所面对的族群。这种类型的民族融合，基本上是在相对和平的状态下进行：从时段上看，仅仅是在相互发生接触的最初阶段，双方有过短暂

的战斗，此后的长时间内，双方大体上都能和平共处；即便是在最初短暂的战斗过程中，双方也都没有发生过大规模残杀对方，以灭绝对方肉体为终极目标的血腥事件。从是否能够以人为本，是否能够尊重生命的人类基本准则来衡量，这种类型的民族融合，是最具有典范性，因而也最值得肯定的民族融合。

由于诸葛亮所代表的蜀汉政权，在平定南中的过程中，在综合力量上一直处于绝对优势的支配地位，所以这种相对和平型民族融合的出现，就更加难能可贵。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发生的冲突型民族融合相对比，作为主事者的诸葛亮，堪称是善莫大焉，功莫大焉。

《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习凿齿《襄阳记》有如下记载：“建兴三年，亮征南中，谲送之数里。亮曰：‘虽共谋之历年，今可更惠良规。’谲对曰：‘南中恃其险远，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反耳。今公方倾国北伐，以事强贼；彼知官势内虚，其叛亦速。若殄尽遗类，以除后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仓猝也。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亮纳其策，赦孟获以服南方。故终亮之世，南方不敢复反。”

这段记载，后世学者多所引用。但是，史文将诸葛亮平定南中的基本方针，即争取人心而非消灭肉体，完全归功于马谡的建议，这种说法恐怕值得商榷。据《三国志》卷三十三《后主传》记载，南中出现叛乱，是在建兴元年（223年）的夏天，而诸葛亮出兵南中，是在建兴三年（225年）的春三月，间隔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如果说，在这两年的时间里，诸葛亮一直都没有在基本方针上作出过基本成熟的考虑，要等到上百万大军已经出发之后，在马谡的指点之下才恍然大悟，那么诸葛亮这位辅政大臣兼全军统帅，也当得太不称职，太不稳重了。以他那样做事极其谨

慎周密的品性而论，可以说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

事实上，诸葛亮之所以会独树一帜，将平定南中处理为相对和平型的典范性结果，自有其多方面的深刻原因，马谡所论，只是与他本人的考虑正好吻合而已。

深刻原因之一，是来自治理国家方面的考虑。刘备去世后，诸葛亮接受遗命，全权治理朝廷军政。而他所治理的蜀汉，是三国当中综合实力最弱的国家。综合实力中，最关键的因素又是人口的数量。据《后主传》裴松之注引王隐《蜀记》，蜀汉灭亡时，在册百姓九十四万，将士十万二千，官吏四万，人口总计才一百零八万二千人。而孙吴灭亡时，在册百姓二百三十万，将士二十三万，官吏三万二千，后宫五千，人口总计二百五十六万七千人，详见《三国志》卷四十八《孙皓传》裴松之注引孙盛《晋阳秋》。至于曹魏，据《续汉郡国志》刘昭注引皇甫谧《帝王世纪》提供的数据，景元四年（263年）攻灭蜀汉时，与蜀汉合计为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一人。如果减去上面蜀汉的百姓人口数九十四万，则曹魏的人口数为四百四十三万多一点，与杜佑《通典》卷七《历代盛衰户口》所计算的结果相符合。以上的人口数字，虽然现今学者有所怀疑，认为数量偏低，但是即便偏低，也是三国都偏低，所以三国之间人口数量的相对比例，却是准确可信的。至于相对的比例，大体说来，孙吴人口是蜀汉的两倍，而曹魏又将近是孙吴的两倍。既然蜀汉的人力资源，已经是三国当中最为短缺者，那么要对南中的居民大开杀戒，使得人力资源更加短缺，就是当政者诸葛亮绝对不能做的大蠢事。

深刻原因之二，是来自力量对比方面的考虑。南中是一个广阔的地域，其中的居民数量不在少数。虽然蜀汉时期南中的人口数量，在传世的文献典籍中没有明确统计，但是可以通过间接



的推算，大约估计出来。在今本《后汉书》包含的司马彪《续汉郡国志》“益州”条下，列出了东汉益州下属的十二个郡国，以及各个郡国的在册人口数目。其中，后来属于南中地区的郡国有五，即牂牁郡、越巂郡、益州郡、永昌郡、犍为属国。如果以万人为单位，万人以后四舍五入，这五个郡国的人口共计是二百九十四万人。而整个益州十二个郡国的总人口是七百二十五万人，所以这五个郡国的人口数，在比例上占益州总人口数的41%左右。《续汉郡国志》的数据，来自东汉顺帝永和五年（140年）的官方统计，所以这是诸葛亮出兵南中八十五年之前的情形。另据《晋书》卷十四《地理志上》提供的数据，原来属于南中地区的宁州，有居民八万二千户，原来属于东汉益州其他部分的梁州、益州，各有居民七万六千三百户、十四万九千三百户，人口数字则均未提供。按照户数计算，南中所占的比例，是三者总数的36%左右。这是公元280年西晋统一之后的数据，也就是诸葛亮出兵南中五十五年之后的情形。之前和之后的比例，相差不大，平均值是38.5%左右。再按照蜀汉总人口一百零八万计算，当时南中的人口，约为四十二万左右，非南中的人口为六十六万。换句话说，就算真的要灭绝南中的居民，那怕竭尽全力，也是六比四的态势，能办到吗？根本办不到。

深刻原因之三，是来自北伐用兵方面的考虑。诸葛亮出兵南中，放在他所运筹的全局来看，实际上是为两年之后的出兵北伐，预先做好充分的准备，是北伐大戏演出之前的暖场和序幕，完全属于北伐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南征为北伐所做的充分准备，至少有如下三点。

首先，南征是一场实战性质的大练兵。要想北伐，蜀汉军队必须具备极为强劲的山地行军作战能力。因为要想进攻曹魏，首先就要翻越双方的分界线秦岭山脉。而秦岭山脉不仅海拔高，最

高超过3000米，而且纵深长，最短的穿越路线也有400多里。山路崎岖险峻，行军已经非常困难，还要与对方激烈战斗，冲锋厮杀，没有极为强劲的山地行军作战能力，可以说是毫无胜算。把原本长期活动在成都平原地区的蜀汉主力部队，带领到南中的云贵高原山地之上，翻山越岭，跨江渡河，跋涉千里，进攻防守，这正是山地行军作战能力最理想的现场训练。

其次，南征又是一场精锐兵员的大征调。三国的军队数量，大体上是该国人口的十分之一，所以蜀汉的军队是十万人左右。而曹魏的军队和人口，都在蜀汉的4倍以上，而且拥有三国时期最为强大的骑兵军团。因此，蜀汉要进攻曹魏，一是必须增加军队的总数，二是必须提高精兵的比重。而当时的南中，正是蕴藏精兵的地区。当地一个叫做“青羌”的民族，历来以能征惯战而闻名，与巴郡一带的板楯蛮，并称为益州的两大精兵。据《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记载，平定南中之后，诸葛亮“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由五支分队组成的这支劲旅，既然有“飞军”的美名，而且“所当无前”，也就是所向无敌，可见他们在山地作战中，不仅行动快速无比，而且骁勇善战，这正是诸葛亮北伐时最为急需的精锐兵团。据《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习凿齿《汉晋春秋》、卷四十三《王平传》记载，这一精锐兵团的指挥官，正式名称是“无当监”，由蜀汉名将王平担任。在街亭一战曾经占了上风的曹魏名将张郃，后来就是在追击王平的途中，中了这支劲旅设在木门谷的埋伏，被利箭射死。由此可见，如果当初北伐首战时，先锋部队的主将不是由马谡担任，而是由王平担任，街亭之战就不会是令人遗憾的结局。

再次，南征还是一场战略物资的大开发。大规模的战争，必须有战略物资的强大支撑。而南中的广阔地域，恰好又是盛产军用物资的地区。据《华